

遗传学界新的重视。

自 1979 年长沙会后，我个人便产生寻找潘先生优生著作的想法，曾来北京原北图（文津街）找到部分资料，至 80 年代初，我曾撰写了关于我国优生学过去发展历史的几篇文章，但仍感不够，许多已知的文章没有找到，如《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宗教与优生》、《优生与抗战》等。1981 年我专程来北京，由中国人口学会、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天路介绍到中央民院图书馆查寻资料，当时一位年长先生说这些资料目前均交由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保管，他的丈夫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我即到鼓楼西大街找到王庆恩，他在办公室接待我，并说乃谷已去美国进修，只有等她回来再说。

直到 90 年代初，我来北京中国优生协会任副会长兼学术部工作，方与北大社会学系潘氏两位女教授认识。1999 年恰逢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潘光旦文集》（第 5 卷），获乃穆、乃谷二教授赠我《文集》，喜出望外，几乎通读，对潘光旦先生的优生思想，才有了较深的体会。虽然在先生 100 周年华诞时写了几篇关于先生优生思想的探讨论文，但终因才疏不能窥其全豹，但有了这新的 14 卷《文集》，我将深入学习，从此宝贵文库中挖掘其关于人类发育即生存发展（位育）的科学真谛，为中国的科教兴国提供点滴资料。

《潘光旦文集》编辑经过

潘乃穆

首先向各位汇报一下搜集、整理和编辑潘光旦著作的简要经过。

关于潘光旦著作的总量，原先我们粗略计算是 600 万字左右。结果《潘光旦文集》14 卷实际编入了 640 万字，余下未编入的部分还有中文约 100 万字（包括书评、短评、译文、杂钞等）、英文文章约计 400 页，提纲及卡片等尚未计在内。

从开始搜集作者的著作到《潘光旦文集》全 14 卷的出版，从 1978 年底开始到 2000 年底为止，前后经历 22 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78 年底到 1991 年，这段时间主要进行搜集工作；同时想要尽先出版他没有发表过的遗稿。1978 年底在费孝通先生倡议之下，潘乃谷由内蒙古借调来京，开始搜集整理潘光旦的著作。1979 年春邓小平、胡乔木指示重建社会学学科，潘乃谷随同费先生参加学科重建工作，搜集整理潘著只好成为我们业余的工作。1988 年潘乃穆退休以后，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在此期间，出版过几种潘著：《优生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旧著重刊，1981 年）、潘乃穆、潘乃谷整理《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一次印刷，1988 第二次印刷）、胡寿文合作《人类的由来》译注本（商务印书馆，1983 年）、胡寿文重校《性心理学》译注本（三联书店，1987 年）、中央民院吴丰培先生推动的《铁螺山房诗草》影印本（群言出版社，1992 年 1 月）。还初步整理了《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译注稿。

1992 年在潘光旦的著作大体收集齐的基础上，在得到潘光迥、袁勃等先生资助出版经费的条件下，我们和当时北大出版社总编辑苏志中先生商定出版《潘光旦文集》，确定了总体计划。1993 年初第 1 卷交稿，当年出版。从 1993 到 1997 年陆续交稿至第 6 卷，出版至第 5 卷。第 6 卷录排



已完成，但未付印。因当时任总编辑的温儒敏先生建议修改出版计划，提出了压缩篇幅，减少卷数，由逐卷交稿出版改为全部交稿以后一次出齐的方案。1998年第7至11卷陆续交稿，1999年责任编辑发稿，录排、校对完成。1999年12月至2000年7月，第12至14卷译著相继交稿，由于责任编辑和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所以他随即发稿。2000年12月完成第12至14卷的全部录排、校对工作。又对已出版的第1至第5卷再次校对，以便第2次印刷。全部文集的编辑工作前后历时9年。

以下着重说明几点：

(1) 搜集作者的著作是编文集的基础工作，回顾起来是整个工作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一步。作者生前对自己的著作并无完整记录。他在“文革”动乱中于1967年去世。当时他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书房、卧室都被查封，被迫住在厨房外没有供暖的披间里的水泥地上，因而患病不治。我和潘乃穉在北大被批为“黑帮”，由群众监督劳动。在那种情况下，作者没有任何遗言。我们在“文革”期间向中央民族学院捐赠了他的全部藏书，也没有机会亲自清点他的遗著和手稿。再追溯过往的情况，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者就被作为北京市高校两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遭受严厉的批判，在学术方面也笼统地全盘否定，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早就“批倒批臭”了。我们那时候还都是学校里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停办，学科中断，作者转而从事民族史的研究，不再重操旧业。我们对他早年的许多学术活动不了解，对他的主要著作也可以说是没有读过。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搜集，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全部搜集整理的过程也就是对他全部求学、治学生涯以及学术思想的从新了解和学习的过程。专著部分多是已经出版过的书，却也并不容易找。在80年代初社会学专业开始筹备的时候，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根本还没有社会学这一类。北大图书馆里，潘光旦的书有目录没书，因为和其他许多解放前的非马列社会科学书籍一样，长时间不出借，已经从书架上撤掉。后来才在保存本室可以借阅。国家图书馆也是一样，这类书单另有一个目录，我去查的时候可以借，但目录柜还单放在目录厅的楼上，现在则和其它目录柜排到一处了，这类书籍单有一个名称叫“蓝参”。到1991年我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去，这类书（包括潘译《赫胥黎自由教育论》）还只许教师借阅，学生不能看，当时北大已经没有限制了。至于文章散载于各种报刊杂志，当然更难查找。

作者生前有两次自编系列的文集，所有稿件早已下落不明。第一次在抗日战争初期，作者南下以前，他曾编成《优生闲话》（人文生物学论丛第四辑）、《民族兴衰各论》（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五辑）、《家谱新论》（人文生物学论丛第六辑）三本稿件，在日本侵占北京期间损失。第二次在1948年，他又重新搜集、编成《家谱、传记、人才》、《环境、民族、制度》两本文集和《冯小青》第三版，1949年5月在待印中，以后情况不明。我们这次可以说是第三次重新搜集这些报刊文字，除一部分可根据已知线索来查找外，相当部分几乎是大海捞针式的把有关的某一时期的某一报刊从头到尾地翻阅。例如二三十年代他所参与编辑和撰稿的刊物《华年》和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由于他采用过许多笔名是我们原来不知道的，阅过以后，还要两相对照，才识别了作者使用过的一些中、英文笔名，肯定相关的一些文字确为他的作品。我很感谢北大图书馆过刊部的谭名声先生提供给我他记录的《云南日报》上多篇潘作文章的题目，但是抗战期间的报纸是草纸所印，纸张都酥了，一碰就掉，借阅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复制了。后来我去清华图书馆再次借阅复制。

总而言之，我们竭尽全力查找，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我为此曾经去查找、复制资料的图书馆有：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 16 处；档案馆有：中央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等 7 处。遗憾的是仍然有些作品没能找到。如 50 年代末的《浙赣两省畲民访问报告》和 60 年代初的长篇研究论文《从徐戎到畲族》，虽然在民院交还我们的赠书清单上列有，但由于后来他们只把书籍编目，其他资料未编，而无从查找了。

(2) 对于编入文集的著述，我们都作了审慎的校订。有些文章发表或出版过不止一次，凡是能够找到的，均经查核校对，辨认最佳版本，并改正讹误。作者旁征博引，涉及中国古籍甚多，不但经史子集，而且多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例如《性心理学》译注）。对于引文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只要北大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种书刊）作了查核，如果发现异文往往要查到两个版本以上，对某些引文作了订正。所涉及到的外国语言文字也有多种，我们也作过查核，其中比较多的是英文，其他有法、德、俄、意、日、拉丁、希伯来、新犹文等（如《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数量虽少，查核起来却比较费时费力。对于译著中的大部分，曾经参照英文原本进行过校订。

(3) 除上述校订工作之外，由于出版社要求提交简体字的稿件，因此我们有大量录入或抄写的工作量。又由于争取时间，我们与责任编辑共同参与了责任编辑发稿录排以后的历次校对工作，力求减少错误到最低限度。潘著还有一个特点是包含相当多的谱系图，由于印刷厂录排有困难，因此从第三卷以后的所有谱系图以及部分图表由潘乃穆自行制出激光样张。总之，这套文集的编纂工作人力少、任务重，始终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下。除潘乃穆、潘乃和为主力外，还有石炎声、王庆恩、潘乃谷、潘乃穉、胡寿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工作，同心协力完成了这项任务。

(4)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尊重和保持遗著原貌的原则。在这点上，我们和出版社的领导、责任编辑取得共识，对原著译的内容和文字，甚至于某些标点符号，除确属讹误外，尽可能避免更动。对“生僻”词语或不合乎今天规范的词语要不要改的问题，我们考虑容易发生疑问的这类词语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当时许多学者使用，今日不再使用，例如今日说“系统”，那时可以说“统系”，《吴宓日记》里也有这个词，这属于时代变化，语言也有变迁的情况；一种是属于受吴语方言的影响，因为作者是江苏宝山县人；一种是属于作者个人遣词用字的习惯特点。经过和责任编辑再次的商讨，决定还是坚持原定的规则，不予改动。这时正好看到新出版的《费孝通文集》，费先生在《文集前记》中提出一条原则：“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论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我觉得和我们的想法也相符。至少有一点可以让读者放心，就是对这类可能引发疑问的词语，我们都作过核查，其中绝大部分可以从《辞源》中查到，只有个别的字需要查《康熙字典》。

以上重点说明《文集》编纂工作的一些情况。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但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中一定会有错失、疏漏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对于完成全部文集的编辑校对工作，我的体会：一是必须锲而不舍。潘光旦的著作在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就不可能出版了。到 1980 年给他彻底平反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十三年。当时我就想到，只有当他的学术著作能够出版，才能说是彻底地为他落实了政策。同时，出版他的著作，也是社会学学科重建的需要。1988 年时，我 56 岁，考虑到只有退休下来才能够集中精力做这件事，而且我当时和潘乃谷同在社会学系工作，也有不便之处。因此决定退休，加紧搜集整理，从



此锲而不舍，直到《文集》的出版完成。现在未编入这部文集的潘光旦著作尚待整理，我们还须继续努力。

其次，在我准备这部《文集》稿件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前辈学者著作量之大，研究之广之深，以至于我们学力不足的人，编辑整理起来还要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又接触到与潘光旦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著作文献，这些学者曾经在学术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全国知名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至今出版了文集或全集的人数尚不多。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社会学家，又如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教授们，情况都是如此。我深感这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在学术传承方面欠了许多历史账。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有需要也有条件来进一步解决一些积存的问题。许多学者和出版单位虽然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采取具体措施来及时整理出版上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如果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再来做这件事情，他们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多了。

我借此机会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这部文集的出版表示感谢。对关照这部文集出版工作的历任社长、总编和参与复审、终审、装帧设计的各位编辑先生以及总编室正、副主任，发行部正、副主任表示感谢。从《文集》的总体规划到编辑出版，他们都曾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只提到以下几位：原任总编的苏志中先生，他最早对文集的总体规划提出原则性的意见，例如那时我们为适应社会学学科当前的需要，曾经有过按著作内容分类编文集的想法，他认为还是按著作时间先后编为妥，因为有些著作是很难分类的，这的确是经验之谈；他希望我们把这部文集编成潘光旦著作的最佳版本。曾任总编的温儒敏先生，建议日记可全部收入，并提出应列入年表。但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对年表未能全面详列，只细列了著作部分。彭松建社长和张文定副总编一直关心、支持这部文集的工作，亲自过问。郑昌德编辑自始至终担任复审。美编常燕生先生对这部文集的封面作了再次的设计，并亲自制作了全部的卷首图片。

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沈昆朋先生，他是北大出版社资深的编辑。他自始至终负责这项工作。从商定分卷计划及编辑凡例开始，随后逐卷详细地审定和编排全部文稿，即便在自己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直到印刷、装订的各道工序全部完成。由于这部文集的工作过程延续多年，工作辛苦，不但他的节假日取消，甚至健康不好也不肯休息。实际上他的一些困难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在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度右肩内出血，大家劝他暂停工作，他却坚持用左手写字。当他左肩又内出血，吃饭都要夫人帮助的时候，他还坚持看稿，由别人代为翻页。当他一度住医院期间，理所当然应该暂停工作，他却带了他家的小炕桌在病床上工作。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最后我要向我本单位社会学系的领导表示感谢。在我退休之后，仍然关怀到我的生活，并帮助我改善了工作条件。

谢谢大家。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

